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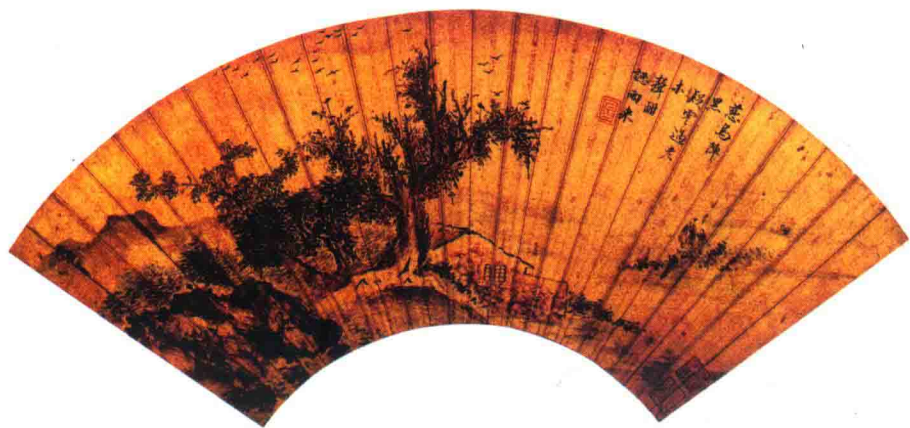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董仲舒、王充

教 育 名 著 导 读

主编 王凌皓

编著 杨 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I A O Y U M I N G Z H U D A O D U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董仲舒、王充教育名著导读

主编 王凌皓
编著 杨 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仲舒、王充教育名著导读 / 杨冰编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11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 王凌皓主编)
ISBN 978-7-5472-1776-4

I. ①董… II. ①杨… III. ①董仲舒(前179~前
104) — 教育思想②王充(27~97) — 教育思想 IV.
①G40-09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4862号

董仲舒、王充教育名著导读

DONGZHONGSHUWANGCHONGJIAOYUMINGZHUDAODU

主编/王凌皓

编著/杨冰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封面设计/李岩冰 董晓丽

印装/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160千字

印张/12

版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1776-4

定价/26.00元

目 录

董仲舒教育名著导读

- 一 董仲舒其人 / 2
 - (一) 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 / 2
 - (二)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 3
- 二 《对贤良策》简介 / 6
 - (一) 《对贤良策》之成书 / 6
 - (二) 《对贤良策》之篇章结构 / 7
 - (三) 《对贤良策》之历史评价 / 7
- 三 《对贤良策》教育章句导读 / 9
 - (一) 教化为治国大务 / 9
 - (二) “天命”、“情性”与任德任刑 / 14
 - (三) 三大文教政策 / 15
- 四 《春秋繁露》简介 / 25
 - (一) 《春秋繁露》之成书 / 25
 - (二) 《春秋繁露》之篇章结构 / 27
 - (三) 《春秋繁露》之版本流传 / 30

(四)《春秋繁露》之历史评价	/ 32
五 《春秋繁露》教育章句导读	/ 36
(一)论人性和教育在人发展的作用	/ 36
(二)论道德教育	/ 43
(三)论教学	/ 80

王充教育名著导读

一 王充其人	/ 94
(一)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	/ 94
(二)王充的思想体系	/ 96
二 《论衡》简介	/ 101
(一)《论衡》之成书	/ 101
(二)《论衡》之篇章结构	/ 103
(三)《论衡》之版本流传	/ 105
(四)《论衡》之历史评价	/ 106
三 《论衡》教育章句导读	/ 108
(一)论人性与教育、环境的关系	/ 108
(二)论培养目标	/ 124
(三)论教育内容	/ 144
(四)论学习	/ 152

参考文献	/ 183
------	-------

董仲舒教育名著导读

一 董仲舒其人

(一) 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

儒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两次重大的改造。一次是西汉的董仲舒,纳阴阳五行学说入儒,将儒学神学化;另一次是南宋的朱熹,纳佛、道二教之思想入儒,将儒学理学化。董仲舒不仅是西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1]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西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董仲舒自幼勤习儒家经典,是研究《春秋公羊》学的著名学者,汉景帝时曾为博士。他以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和“三年不窥园”的治学精神,赢得了当时读书人的尊敬,许多人纷纷聚其门下,拜他为师,这一切使董仲舒获“博学君子”、“汉代孔子”之美誉。武帝即位,董仲舒在“对贤良策”时提出的建议,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开始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先后担任过江都王刘非和胶东王刘端的国相。但因灾异下狱,被贬为中大夫,在政治上终不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不问私家产业。董仲舒讲学有两种形式:一是“下帷讲诵”,二是“弟子相传”。董仲舒讲课时,他在帷幔里面讲,亲授高徒弟子,再由高徒弟子转相传授给程度较低的新同学,以提高教学效率,由此可见,其从学弟子之多。董仲舒晚年辞官回家之后,仍心系天下,朝廷每遇大事,则派人征询董仲舒的意见,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

[1] 王凌皓. 中国教育史纲要[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155.

之，其对皆有明法。”^[1]

董仲舒一生著作很多，但大多失传，现存著作仅有《春秋繁露》，以及《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有关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可以较为客观地了解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故，葬于西汉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路过其墓地，为了表达对这位具有卓越才华且忠心耿耿的老臣的敬意，特地下马步行，自此以后文士路过此地“莫不下马”，董仲舒的墓地由此而称“下马陵”。

董仲舒一生从教数十年，通过授徒讲学为汉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其弟子中，既有叱咤于汉代政治舞台的卿相大夫，如官至梁相的“兰陵褚大”、官至长史的“温吕步舒”；也有蜚声于文坛的学者、教育家，如被称为“守学不失师法”的嬴公。嬴公一边从政一边讲学，曾授徒东海孟卿和鲁眭孟，使二者成为当世名儒，而孟卿再传董学于戴德、戴圣叔侄二人，成就《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直接影响、作用于西汉及其以后的官学、私学和科举。鲁眭孟授徒颜安乐和严彭祖，使二者成为修《春秋公羊》学的知名学者，所以董仲舒无愧于“汉代孔子”之盛名。

（二）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西汉正宗经学的代表人物。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他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根据景帝、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汇起来，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作为维护中央集权

[1]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570。

封建统治的理论武器，他对汉代的文教政策有很大的实际影响，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王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王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以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朝代的更迭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就大祸临头了。

董仲舒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

[1]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570.

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王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

二 《对贤良策》简介

(一)《对贤良策》之成书

《对贤良策》见《汉书·董仲舒传》，是以哲理为根据的政论文。汉初所实行的“无为”政治虽然给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也暴露了种种弊端。汉武帝即位以后，面对“无为”政治留下的种种社会矛盾，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有所抉择。如要实行“有为”政治，是采用“法治”还是“德治”？在政治上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汉武帝正是带着这些问题举行贤良对策的，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到朝廷参加对策。贤良、文学参加对策的前后约有一百多人。董仲舒作为贤良也被推举参加对策。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针对汉武帝提出的问题，董仲舒一一做了回答。这三次对策文字，就是《对贤良策》。文中着重讲到天人感应问题，又称“天人三策”。汉武帝欣赏董仲舒的对策，任他为江都相，从此董仲舒进入仕途，他之后又任过中大夫、胶西相。董仲舒辞职后退居长安陋巷。虽然如此，朝廷议论不决的问题，皇帝还派廷尉张汤等人多次到陋巷请教董仲舒。

他从“天人感应”的观点出发，认为天是至上的主宰，王权是天授的，所以王者须“承天意以从事”。《春秋》大一统，是天地的不变的原则；而政令统一又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要改变汉初那种“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学术混乱局面，统一思想的程序应该自上而下。由于董仲舒是一个儒家学者，所以董仲舒一开始就将思想的基调定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而儒家

强调正定名分,最合乎中央集权政体的需要,故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以天道有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意尊阳而卑阴,因此为政当任德教而不任刑罚。人才问题是实行“有为”政治的又一急需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吏为民之师帅,必求其贤,求贤则莫如察举与养士,养士之大在兴太学。“太学者,贤者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也”。这些思想,虽非董仲舒首次提出,但经过他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对后世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对贤良策》之篇章结构

《对贤良策》是董仲舒应汉武帝贤良文学诏所写的三篇政论文。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在第一次对策中,董仲舒以天命神学讲明了维护汉王朝统治的依据;第二次对策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对策的主要内容是“天人感应”的学说,即神权、君权的关系。三策都曾深入阐述了“尊崇儒术”的思想。

第一策主要是“天命”和“情性”问题;第二策共四个问题,分别是①关于黄老无为和孔孟有为的问题。②黄老尚质与儒学尚文的问题。③任德任刑的问题。④现实的执政问题。第三策提出“尊崇儒术”的思想。^[1]

(三)《对贤良策》之历史评价

《对贤良策》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封建政权及伦理道德的合理性,提出了君权神授和王道之三纲皆源于天等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学术思想,是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神学化的儒学。这一学说满足了当时社会经济、政

[1] 刘新科,栗洪武.中外教育名著选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5.

治、文化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构成了汉代上层建筑的中心指导思想。针对董仲舒的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①立五经博士;②开设太学;③确立察举制。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政策特别是文教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汉书》的作者班固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这些都有助于巩固当时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由此我们可以比较秦汉的文教政策,秦始皇和李斯都曾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但其结果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而董仲舒、汉武帝等则吸取历史教训,改变思想路线,成功地将儒学抬到了独尊的地位。其中的原因除了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本身所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符合不同的时代要求以外,与不同阶级统治集团在实行思想统一的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措施有密切的关系。秦朝一味地采取“法治”的政策,对异端思想实行严厉的打击,而汉朝实行的是一种名利引诱的政策,鼓励儒学,冷淡异端,显然后者的方式更成功、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起到了控制思想又缓和矛盾的作用。

但是,成功也并不等于合理,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独尊的地位,无疑对各种非儒家的学术思想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不利于文化的整体发展。

[1]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570.

三 《对贤良策》教育章句导读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整个思想学说关系十分密切。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是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并将其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之后形成的神学化的儒学，在其神学化的儒学的影响下，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三大文教政策，即“兴太学以养士”、“重选举以取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汉代文教的发展乃至政治的改革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影响深远。本编则主要节选了其中阐述教化重要性的章句，其所强调的“强勉”、“刻琢”、“更化”等等，对于现今教育思想的改革与教师道德的培养，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一）教化为治国大务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呼！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

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仲舒对曰：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懈”，《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

绝。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1]

汉武帝策问董仲舒“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为何有善恶之分？在这种情况下，当如何才能使“百姓和乐”，德泽普降呢？董仲舒以天命神学讲明了维护王朝统治的依据，同时强调了人事的重要，董仲舒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应“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要进行教化？教化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战国时代角力、秦代任刑罚以后，人们觉得模糊了，有必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统治者那里，对教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危害性就更大。当汉武帝提出如何才能长治久安，“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时，董仲舒趁机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他说：“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教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治理国家有一定的路线，就是道。道要由仁义礼乐这些内容来体现。这些内容是圣人根据人的一般情性来规定的。所以圣人虽然早已死了，而他们制订的礼乐制度还存在，还能“接于肌肤，臧于骨髓”，产生深刻影响，可以“变民风，化民俗”，起着明显的移风易俗的作用。人民有性和情两方面，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人的善恶仁鄙在于“陶冶”。统治者既可以用德政来引导人民向善，也可以用暴政引导人民趋恶，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引导。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

[1]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561—562.

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颇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1]

董仲舒指出：“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人民的性情可塑性很强，就看统治者如何塑造他们。人

[1]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7.563—564.